

目 錄

科学研究是否需要党的领导

- 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的研究? 陈建功 (1)
驳斥右派份子的反动科学纲领 顧翼东 (5)
共产党能够领导科学 孙宗彭 (10)
斥“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领导內行”的謬論 黃綠芳 (12)
訪吳斐丹教授斥“教授治校”論 文匯報記者 郭根 (15)
斥“教授治校”的謬論 王欣夫 (19)
“教授治校”問題的本質 吳征鑑 (22)
党不能领导科学文化嗎? 董問樵 (25)
“教授治校”是一服糖衣毒藥 李振麟 (27)
外行可以领导內行嗎? 盛祖嘉 (31)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为什么站起来了? 苏乾英 (34)
党对報紙工作的领导不可动摇 余家宏 (37)

× ×

- 駁“党天下”論 鄭紹虞 (41)
右派分子“九斗”論 秉南 (45)
駁斥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 李鐵民 (47)
总路綫公布以后，就“人心向背”了嗎? 陳觀烈 (50)
“党天下”論的實質 姚善友 (55)

× × ×

- 右派对积极分子的进攻 伍蠡甫 (57)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诬蔑非党积极分子? 苏紹智 (64)

陰險的挑撥 漢之珍 (67)

× × ×

教学改革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 苏步青 (69)

高等學校必須有党的领导 盧慶駿 (71)

解放以來的英語專業教學 葛傳榮 (74)

駁斥楊兆龍所說的“法律系办得最坏”的謬論 丘日庆 (76)

不准右派分子抹杀我們教學改革的成績 吳浩青 (82)

外文系的“教學改革一团糟”嗎? 蕭亞芬 (85)

× × ×

駁斥右派诬蔑思想改造的謬論 全增嘏 (91)

駁斥右派分子对思想改造的謫言 曹國卿 (95)

肅反運動不容污蔑 朱伯康 (99)

關於所謂“歷次運動，尤其是肅反運動的

合法性”問題 王式成 (103)

右派分子否定肅反運動的惡毒意圖 薛應龍 (105)

論專政的必要性和肅反的合法性 楊峯 (110)

从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來看肅反的成績 胡榕樹 (119)

× × ×

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旧社會的產物 伍丹戈 (123)

為什麼說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

上的一次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蔣學模 (127)

× × ×

駁斥右派分子楊兆龍對我國立法事業的

齷齪污蔑 張企泰 (131)

駁斥王造时的“美國民主是虛偽的，但法律是

認真的”謬論 丘日庆 (137)

右派分子王造时、楊兆龍誣蔑人民法治………	向哲浚 (143)
从法律的阶级性的角度来看右派分子楊兆龍	
向党进攻的陰謀……………	張匯文講 (146)
再駁王造时所提倡的歐美式的民主与法治………	楊巩祚 (152)
斥右派分子在法治問題上的謬論……………	陳华庚 (155)
不許开倒車……………	胡其安 (158)
駁斥王造时宣揚“美国法治精神”的謬論……………	刘家驥 (163)
駁右派分子王造时……………	趙人龍 (166)
駁斥王造时的“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	
荒謬言論……………	李 濟 (170)
批判所謂資产阶级“兩院制”的反动論調……………	黃榮釗 (173)
駁楊兆龍的“旧法可用論”……………	夏鎮江 (179)

科學研究是否需要黨的領導 黨能不能夠領導科學研究？

陳建功

為着要很快地把我們建設成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要迅速壯大我們的科學技術力量，要把最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門在十二年內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使在建設中遇着的一切科學問題和技術問題，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全國極大多數科學工作者，都感到興奮和鼓舞，決心為這個號召付出最大的力量。

解放以後的幾年當中，由於黨的正確領導，我國科學技術的落後狀態，有了明顯的改變，科學隊伍得到大量的補充，許多部門如機械製造，化學工業，冶金工業，地質探勘，醫藥衛生，地震氣象等等以及基礎科學的研究，青年科學干部的培養，都結合著國家的實際需要在進行著。但是儘管這樣，我國在目前科學技術還遠遠地落後於最先進的國家，如核子物理，電子學，半導體物理學等學問的技術應用幾乎是空白。空白部門必須迅速填補，較有基礎的部門必須加強和提高，務期於十二年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一個非完成不可的歷史任務。

一般地說，任何政策，任何法規，在還沒有公開討論以前，党中央都已經根據實際有了相當成熟的底稿，憲法的制訂，就是一個实例。科學技術的远景规划是不在此例的。于是乎各个科学家，都紛紛作了許多孤立性的研究計劃，數學

應該如何如何發展，物理學應該如何如何發展等等。領導上把这些東西綜合起來一看，有許多好的意見，但發現依照这个式樣是肯定地不能完成十二年內要趕上先進水平的任務的。領導上指出必須以任務為目標，科學研究才有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意義。後來從十個方面，提出了幾十項科學任務，包括着幾百個中心問題。這些任務的完成，將對我國科學在十二年內提高到先進水平，起決定性的作用，大多數的科學家，都是歡欣鼓舞的。

但是科學家中的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們，不惜破壞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的全面性，另外提出一個所謂“科學規劃問題”，寫成“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的文章（見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光明日報），其中有“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裡，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裡”的話。這不僅僅與上述孤立性的計劃有同樣毛病，並且它是一支毒箭。孤立性計劃的缺點，並不是預先明白的，而右派分子的毒箭，是有意識的，他們想把一件一件的科學工作都孤立起來，來破壞黨對科學研究的領導，反抗社會主義建設，他們想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是可忍孰不可忍！要知道現代科學中，任何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發見，決不能光是靠個別科學家孤立的研究來完成，而必須依靠若干部門的配合和科學家的合作的。

向科學進軍，是羣眾性的，不但包含個人的科學研究，也包含着集體的科學研究；對社會主義建設來說，後者比前者還要貴重。集體研究需要正確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橫衝直撞的科學研究不僅無益於人民，還可能貽害全人類。通過原子核物理學，人們能夠利用鈾、鈦等原子核內所寶藏的

能量來發電，也可以作成原子弹來大量地殺人。何去何從，怎樣利用，要看政治的傾向，要和平利用，必須要有黨的領導。沒有黨的領導來做科學研究，盲人瞎馬，會跌入泥坑。沒有黨的領導，在科學研究機關里，會迷失研究的目的性；在高等學校里，會把教學工作與研究工作對立；在工礦里，青年人會想考博士而不安於崗位。總的說來，無黨領導的科學研究是脫離人民的利益、迷失向科學進軍的路線的。科學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會發現出一些矛盾，會反映出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會反映出觀點和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科學工作者必須要有黨的領導和幫助來統一矛盾，克服缺点。科學工作者，一面研究科學，同時必須學習政治，發揮集體力量，貫徹羣眾路線，才能少走彎路，而這是需要黨的領導的。

右派分子在反動的“科學規劃問題”里狂妄地說：“至于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實際工作中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從表面上看去，他們光是要將科學研究讓它自流，蕩漾無定，其實他們企圖篡奪黨對科學研究的領導，以便取而代之，走反社會主義的路線。科學家中的右派分子們惡意地說黨不能領導科學研究，是因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對於這一層，周總理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得非常明白：“如果‘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說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領導本行，這不僅否定了政治對於科學的領導，而且實際上也否定了科學研究工作中的統一領導的任何可能，因為學術上的專業是分門別類的，而世界上同時精通各種科學專業的科學領導干部是不存在的。這種理論，對科學隊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

于科学事業的發展的。”党是能够領導科学的研究的。科学的研究——不論集体和个人——都不可以离开党的领导。

駁斥右派份子的反動科學綱領

顧 翼 东

在學習反右派斗争的各种文件，先看到郭沫若的“駁斥右派分子的反动科学綱領”，使我大吃一惊。开始了解右派分子非但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向我們党、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进攻，而且也企圖在科学領導上向我們进攻。在他們的反动科学规划中，有很多惡意的，荒謬的言論，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保护科学家及那一个做火車头的問題，也就是党能否领导科学的問題。下面就把我个人在解放前后所接触到的事实，对这二問題加以駁斥。

先說：保护科学家的問題。我們科学工作者是現在条件好呢？还是解放前条件好呢？現在，政府鼓励并关心我們的工作，优待我們的生活，这是众所共見的。至于解放前的情形，我想乘此机会就自己所接触到的来講一講。尤其对青年同志，因为青年同志对解放前的事知道得很少。

解放以前的科学工作者，若是在科学院工作，那就不得不在外面兼职，因为薪水太低了，我当时所碰到的熟人，对科学的研究工作都很不安心，时常發牢騷。在教育崗位上教書，情形也是如此，所以解放前有句話是“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从这句話就可体会到当时教育工作的辛苦及不被人家重視的情形。

再看到工厂工作，在抗战时期，我在制藥厂內做过工作的，那时是在資本家下面做医藥工作。

我原是一方面为了救人为了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是为

了推进科学的研究，培养学生结合实际。可是却被资本家玩弄，可以说这是啼笑皆非，我在思想改造时，就说过：“甜酸苦辣”四个字我在资本家手下都是嚐过的。甜就是要你帮他们忙的时候，每天请你吃顿饭，恭维得你无微不至；等到你把实验室组织起来后，工作人员亦招聘起来了，那时资本家就每天同你讲：“什么厂在做什么东西，什么厂做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不做，为什么做得慢”。讲话尖锐难受正是酸得很；我不甘示弱，拼命的搞，同各工厂竞赛，我们工作虽是辛苦，产品虽是多，对于制造方法，也改进了不少，但资方总是说不赚钱，工作人员要加薪没有办法，把我夹在中间，真是苦得很；合作不能长久，工作人员跳出去了，工厂渐渐垮台，在分手的时间资方的手段真是辣得很。所以在过去的社会中，怎样会有科学工作者适当的地位呢？哪一个人来保护我们呢？除掉自我欣赏一些工作成果以外，再也没有旁的安慰了。

我在国民党机关中也做过短时期的工作，那就是钨矿的分析工作。钨是我国的主要矿产，我兴致很高，以为大有事情可做了。其他工作人员也很积极，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例如钨矿中含有比钨更宝贵的元素如铌钽之类，提醒当局应加重视。结果所受到的是批评，降级处分。这样我才了解，他们只是要我摆摆样子，只要我盖章拿钱。所以国民党机关里的“保护科学家”，“提倡科学”是这样一回事！

以上只是说明在旧社会黑暗时代的情形。右派份子的所谓保护科学家，真是欺人之谈。是要把时代的巨轮拖向倒退。

我再谈谈在制革方面，以往我所碰到的，是互相猜忌。我那时是怎样进行研究，不敢同朋友們講，同时，朋友的研

究情况，也不同我講。甚至我和我的学生也不能談工作的問題。挖人，偷等方法是普遍的情形，是正当的作風，把我搞得头晕眼暗，眼看道德墮落無法挽救。解放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大家开誠布公，大家商量討論，分工合作，制造方法相互改进，相互交流經驗，所以制藥工業的發展，近几年來有輝煌的成就。

我現在的研究方向，是在稀有元素方面。以往我曾提出的銻鉨問題，現在政府都加以重視了，我真高兴。今年一月，我參加了科学院召开的稀有元素協調會議。这會議的內容，便是协商和調配有关稀有元素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相当順利。我就覺得，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才可以有科学規劃，才可以召开協調會議。在協調會議中，各人把以往的工作經驗，全部攤开，然后把今年及明年所要做的工作，大家拟定。重复的用协商方法推定由一个單位負責，其他單位協助。有的問題，大家事先沒有考慮到，便自報公議，分別的認下来，討論好了工作路綫，放手去做。既民主，又集中，不是“右派规划”的个人自由主义作風。經過協調會議后，空白点逐漸地填补了，時間也不浪費了。到了一定時間，还要来个全面檢查。十二年内，向科学进军，在重要部門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逐年用这个方式推进，是很可以成功的。若然依照右派分子的规划，还是各人各做，不用集体合作的方式，同解放前一样，互相猜忌，钩心斗角，怎样可以达到我們的期望呢？

我們中間沒有一人不希望向科学进军，不希望提高科学水平，只有通力合作，团结互助，用無产阶级思想看問題、布置問題、解决問題，那就非有党的领导不可，非有党的政

治思想教育不可。

我再談一談科学队伍問題。要进军，必須有堅強的壯大的队伍。对于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工作者，我从畢業到現在，可以說沒有脱离过科学工作的崗位，到現在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照理应当已經培养出来很多人才，可是我的学生到現在在科学工作方面，有多少人呢？不要講三十多年中我在課堂中教过的学生，即是同我做畢業論文的学生，那是开始在1935年到現在也有相当的数目了，在解放前也有很多的人数，但到現在在本崗位工作的，卻是寥寥無几，他們到那里去了呢！我分析了一下，絕大部份是做生意，做資本家了，那就是經不起考驗。培养了他們，結果却改了行，这就是反动政府統治下很大一部分科学工作者的出路。解放以来特別自院系調整后，化学系学生都有了很好的崗位，留校的助教、研究生都在那兒勤懃的学习，只要他們有時間，有工作条件，他們是絕對不會輕視研究工作的，并且他們对科学的研究很热情，会自覺地去进行。我对于培养下一代，方才有希望。所以我們对于年輕教师的工作条件，对于他們科学研究的时间，应尽力的为他們爭取，不能放松。

新老合作也是政府的方針，沒有党的领导，老的不管小的，小的不管老的，科学的队伍怎样能成長呢？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点。最近科学院反右派討論会中，实验生物学家朱洗先生所提出的意見我完全同意。那就是党能把科学领导得很好，布置工作很是全面，不过对于研究工作預計的結果，还是不够滿意，在有的地方結果还是相差可能很远。十二年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期限，現在时间也过去了一年半。这个問題絕對不应当由党負責，那是我們科学工作者

有負于党，对不起党。我們还有等待思想，还不能够全面的團結，培养足够的工作人員，和沒有發揮出所有的潛在力量，在这方面我們的思想還需逐步提高，所以在反右派斗争后，我們更要加紧工作，密切联系，刻苦鑽研，努力的搞好科学。我們要把工作的成果來証实党能領導科学，來証实我們必須要党的领导，來証实社会主义对科学發展的优越性。我們要对右派份子夺取科学領導的夢想，用实际行动，來給以有力的回击。

共產黨能够領導科學

孙宗彭教授在七月十三日生物系全系大会上發言的記錄

張孟聞先生是我的老同學，多年的朋友。我对張先生的問題很关心。就現在已揭發的材料已可認為是典型的反黨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但到現在，張先生仍未老實交代，使我不得不向他說几句話。

現就他所說党委不能領導學校一點來看，就意味着不要黨領導，與“教授治校”的實質一樣。我也是從舊社會中過來的，飽嚐了反動社會中“教授治校”的生活，也對共產黨所領導的新社會有些體會，不妨將新舊社會的教書生活來比較一下，就可以說明學校有共產黨領導和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區別。在抗戰前一年，我為什麼從南京到江蘇醫學院你是知道的，當時你還為我說了幾句不平的話。抗戰初期“蘇醫”遷四川，當時我展開了一些戰時營養問題的研究，工作中也得到些初步結果，但“蘇醫”以不能畸形發展為理由而不支持我，我只好去重慶募化一些工作條件，那知等我回校時實驗室已封閉，我和兩個工作人員都被扫地出門。我到貴陽湘雅醫學院，當時國內丙種維生素缺乏，成為醫療上的問題，當即拼湊了一些條件展開工作，亦找到了一些介決問題的材料（用野生茨藜）。正待繼續展開，又被趕出門。這便是“教授治校”的“好處”。就是只有人與人之間的傾軋，而不能開展真正學術上的合作與論爭。雖然我並未因此而喪失工作的意志，但思想上終因這種流亡生活工作無保障而常自嘆命運多磨，甚至一度打算不教書準備改行了。後來到“浙大”也有過

些風波，幸运的捱到解放。經過院系調整，先到上海医学院，后来复旦。初期，也有待不長的想法，混混算了，但現在留复旦已四年，在这期間發現事實上复旦并無赶我跑的意思，相反的，工作条件逐渐添备，并鼓励我工作。这与以往的遭遇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新社会的制度保障了我。并不是党为了我个人，个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党是为了科学，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設事業貫徹知識分子的政策。

再从整个社会看，全国解放后，物价稳定，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工業建設蓬勃开展。就上海而言，旧时代的流氓危害治安，而現在夜間一兩点钟在馬路上走我也無所惧。这就是新旧社会有無共产党领导的对比。我并非来歌頌共产党的功德，也不是应声虫，但客觀事實摆在面前，为什么你竟看不見？我們旧中国是个爛攤子，社会主义建設中也是有缺点，但你为什么不从發展上来看問題，而老是找岔子呢？我們作为公民要向党提意見，但是善意的建設性的意見，不是破坏性的。以前我也認為共产党不能領導科学，但現在在事實面前，我的观点也改变了。你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当本着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你若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是不会同意我的話的。你現在应轉变立場將一切反动言論，与右派集团的关系、陰謀——进行交代，向人民請罪，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

斥“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領導 內行”的謬論

黃 緣 芳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論中有“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兩個項目，本質上就是否定党的領導的必要性。毛主席在“關於正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中，根據宪法的原則，根據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張，規定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的第五條說：“有利于鞏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這樣算是香花；並且指出“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党的领导兩條”。的確，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為着剷除剝削制度和擺脫國家貧弱的狀態；這是六億人民的意志。要使這願望實現，走資本主義道路行得通嗎？顯然是背道而馳的，既然這條道路走不通，那麼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了，也就必然地要接受党的领导，貫澈党的政策和方針。周總理在一屆人代第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里說：“我們今後的教育方針應該是培养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既然我們要求後一代具有社會主義覺悟，教師自身當然更應該有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了。否定党的领导的分子連起碼的社會主義覺悟都沒有，希望這種人培养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後一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必須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線。既然我們要貫澈党的政策方針，以孚六億人民的願望，那末不管那一部門，都得由党來

領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怎么可以例外呢？王恒守的“教授治校”和曾昭掄的“外行不能领导內行”兩個謬論，就是想把教育和科学研究事業从党的整体領導中分离出来。

王恒守的“教授治校”論，巧妙地先把党委从負責主动地位降为从屬被动地位，換句話說，他用的手段，是从削弱以达到擺脫党的领导的目的。我們承認政治教育措施原則的根据，而教育是实现政治思想的一种手段，兩者不能分开的，“教授治校”論就旨在強为分开。这样做的目的，無非要使教育的方針模糊起来，社会主义觉悟的青年培养不出，而且还供给右派反动的野心家制造宗派，發展陰謀的場所，为資本主义复辟舖平道路。解放前曾經实施过教授治校的学校，哪一个不是給少数人所把持操縱呢？反动派統治时代的局面根本就是爭权夺利，不顧广大人民利益的。“教授治校”制的坏处也不会引人注意的。現在党以公正廉明的态度来领导学校，还有什么可以非議呢？如果还会提出異議，除了別有用心外，还有什么另外的解釋呢？

曾昭掄的“外行不能领导內行”論，是赤裸裸地拒絕党的领导，抹杀科学研究服从于政治的原則，想把有組織、有领导、有計劃地来推动学术活动改变成为無政府自由散漫状态，藉以分散力量，發展派系，以实现野心和陰謀。歪曲领导的本义，是組織力量、总结經驗、制訂計劃、指导方向，而把它說成是具体的局部的操作。正如周总理在一屆人民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指出的：“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这种理論，对科学队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于科学事業的發展的。”

總之，社會主義是我們唯一要走的道路，共產黨是我們唯一可以信賴、依靠、放心跟着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教育和科學研究是我們教師畢生從事的事業。我們要求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不願意毀滅所從事的事業，就只有站穩立場，明辨是非，摧毀右派反動的謬論，使它無所立足，然後我們的事業才會有順利的開展。